

《四时宜忌》瞿佑作辨伪

乔光辉

自明末以来,学界一直把《四时宜忌》视为瞿佑著作。北京图书馆藏明佚名辑《居家必备》本之《四时宜忌》即署名瞿佑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《四时宜忌》称:“明瞿佑撰,佑字宗吉……此书记十二月所宜、所忌……虽博,究不免伤于芜杂也。”清顺治间《说郛续》、清《逊敏堂丛书》、清《得榭楼杂录》均将《四时宜忌》列入瞿佑名下。今人李剑国、陈国军在《瞿佑续考》中也称:“瞿佑著作生前罕有刊刻,获谴后大都散失……今见存者只《剪灯新话》、《归田诗话》、《咏物诗》、《香台集》(残)、《四时宜忌》、《居家宜忌》、《宣和牌谱》、《俗事方》等,不足十种。”^①其他如叶德均、徐朔方、李庆等均沿袭四库总目提要的说法,将《四时宜忌》当作瞿佑作品^②。可见,自明末至今,国内学术界始终没有怀疑瞿佑对《四时宜忌》的著作权。惟法国汉学家陈庆浩教授在《瞿佑及其〈剪灯新话〉》中称:“而署名瞿佑书的还有《四时宜忌》、《宣和牌谱》、《俗事方》、《居家宜忌》等四种书,这些书瞿佑未曾涉及,亦不见于徐伯龄等的记述中,是否为瞿佑著作,仍有待研究。”^③持论甚为谨慎。

笔者从事瞿佑全集的辑佚与校注工作,发现《四时宜忌》署名瞿佑作实乃后人伪托,其著作权当属于明代文人高濂。

明代中期之前的文献,均不见瞿佑作《四时宜忌》的记载。瞿佑本人在《重校剪灯新话后序》自述其著作称:“少日读书之暇,性善著述,萤窗雪案,手笔不辍……久而长编巨册,积成部帙。治经则有《春秋贯珠》、《春秋捷音》、《正葩掇英》、《诚意斋课稿》;阅史则有《管见摘编》、《集览铸误》;作诗则有《鼓

①李剑国、陈国军:《瞿佑续考》,《南开学报》1997年3期,第46页。

②参见叶德均:《瞿佑史料辑》,《戏曲小说丛考》下册,中华书局,2004年,第531页;徐朔方:《瞿佑年谱》,见《小说考信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491页;李庆:《瞿佑及其时代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五十三辑,第268页。

③陈庆浩:《汉学研究》第六卷第一期,第208页。

吹续音》、《风木遗音》、《乐府拟题》、《屏山佳趣》、《香台集》、《采芹稿》；攻文则有《名贤文粹》、《存斋类编》；填词则有《馀清曲谱》、《天机云锦》；纂言记事则有《游艺录》、《剪灯录》、《大藏搜奇》、《学海遗珠》等集。自戊子岁获谴以来，散亡零落，略无存者。……永乐十九年岁次辛丑正月灯夕，七十五岁翁钱塘瞿佑宗吉甫书于保安城南寓舍。”^①也就是说，瞿佑七十五岁自述其著作时，没有提到《四时宜忌》一书。其后，徐伯龄（天顺、成化时人）在其《蟬精雋》卷四“吊城怀古”称：“（瞿佑）著有《通鉴集览镌误》、《香台集》、《剪灯新话》、《乐府遗音》、《归田诗话》、《兴观诗》、《顺承稿》、《存斋遗稿》、《咏物诗》、《屏山佳趣》、《乐全稿》、《馀清曲谱》、《保安新录》、《保安杂录》等集，一见存其目。丧乱以来所失亡者，往往人为惜之，如《剪灯录》、《采芹稿》、《春秋贯珠》、《春秋捷音》、《正葩掇英》、《诚意斋稿》、《管见摘编》、《鼓吹续音》、《风木遗音》、《存斋类编》、《天机云锦》、《游艺录》、《大藏搜奇》、《学海遗珠》等集，兹不可复得也。”^②徐伯龄曾经为瞿佑《香台集》作注，非常熟悉瞿佑的著作，但他所列举的瞿佑著作中也不存在《四时宜忌》。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三十三“瞿宗吉”条列举了瞿佑的作品：“所著有《通鉴集览镌误》、《香台集》、《剪灯新话》、《乐府遗音》、《归田诗话》、《兴观诗》、《顺承稿》、《存斋遗稿》、《咏物诗》、《屏山佳趣》、《乐全稿》、《馀清曲谱》，皆见存者。闻尚有《天机云锦》、《游艺录》、《大藏搜奇》、《学海遗稿》，不可复得也。……左因当道欲得先生事实书籍，询之子孙，所答十止二三，志铭亦亡之矣。因述其梗概。”^③郎瑛成化至嘉靖间文人，读书甚多，在“当道”搜求瞿佑书籍之时，他系统回顾了瞿佑的一生著述，其中所列亦不见《四时宜忌》。可见，瞿佑本人以及死后关注他的文人均没有将《四时宜忌》列为瞿佑的作品。

二

经过比勘，笔者以为后人称《四时宜忌》“瞿佑作”实为伪托，其真正著作权当属于高濂。理由如次：

首先，《四时宜忌》的内容、体例以及结构模式与高濂《遵生八笺·四时调摄笺》的完全吻合。

高濂《遵生八笺》初刻于万历辛卯（1591）仲夏，前有屠隆序称：

虎林高深甫，博学宏通，鉴裁玄朗，少婴羸疾，有忧生之嗟。交游湖海，咨访道术，多综霞编云笈，秘典禁方。家世藏书，资其淹博，虽中郎至赏，束晰通微，殆无以过。乃念幻泡之无常，伤蜉蝣之短晷，悟摄生之有道，知人

①瞿佑著，林芭注：《剪灯新话句解》，《古本小说丛刊》第三三辑，中华书局，1991年，第1974页。

②徐伯龄：《蟬精雋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③郎瑛著，安越点校：《七修类稿》卷三十三，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17页。

命之可延,剖晰玄机,提拈要诀,著为《遵生八笺》……阴阳寒暑,妙在节宣,故有四时调摄。养形以无劳为本,故有起居安乐。^①

这段文字详细记载了高濂作《遵生八笺》的动机,其所描述的“阴阳寒暑,妙在节宣,故有四时调摄”即指卷三至卷六的“四时调摄笺”。卷三“四时调摄笺”之首载:

高子曰:时之义大矣。天下之事未有外时以成者也,故圣人与四时合其序。而《月令》一书,尤养生家之不可少者。余录四时阴阳运用之机,而配以五脏寒温顺逆之义,因时系以方药导引之功,该日载以合宜合忌之事;……随时叙以逸事幽赏之条,和其性灵,悦其心志。人能顺时调摄,勤以导引之功,慎以宜忌之要,无竞无营,与时消息,则疾病可远,寿命可延。诚日用不可去身,岂曰小补云耳?录成笺曰‘四时调摄’。^②

这段自序性质的话综述了“四时调摄笺”的结构布局。以卷三为例,作者先从理论上概述春三月的养生法,并配以脏腑经络图、修养肝脏法与肝脏导引法等;接着依次记载正月所宜所忌与正月修炼法、二月所宜所忌与二月修炼法、三月所宜所忌与三月修炼法;最后讲述“春时逸事”,以“和其性灵,悦其心志”。卷四、卷五、卷六的体制与此一致。可以看出,“四时调摄笺”的整个结构和谐统一,完全服务于作者“远疾病、延寿命”的写作宗旨。

再看今传瞿佑《四时宜忌》的写作结构。该书从正月至十二月,依次录述所宜所忌。一般先介绍该月节气、律、月建、别名、天道等天文节气知识,阐释自然在季节变化中的属性与表现,为下文的养生方法奠定理论基础;然后围绕人们的日常生活诸如饮食、沐浴、出行、问疾、交易、裁衣等论述所宜所忌,同时介绍防病、治病的偏方以及健齿、美颜、养生等方法。这种体例完全符合高濂“四时摄生笺”的写作惯例。

其次,从《四时宜忌》的引用书目来看,也排除了瞿佑作《四时宜忌》的可能性。《四时宜忌》以汇集历代文献的方式叙述四时所宜所忌,诚如四库馆臣评价《四时宜忌》时所称:“此书记十二月所宜所忌,历引《孝经纬》、《荆楚岁时记》、《玉烛宝典》,而兼及于《济世仁术》、《法天生意》、《指月录》、《白云杂忌》诸书,甚至道家符篆亦皆载入。征引虽博,究不免伤于芜杂。”《四时宜忌》引文广泛,驳杂纷繁。其所引诸书,多为明前作品,也有少量明时作品。如果确为瞿佑作,则引用书目当中不应出现瞿佑去世(1433)以后才问世的作品。但是今传《四时宜忌》所引书目中偏偏出现了明中期才问世的书籍,仅略举一二:

《四时宜忌》多处引文源于《便民图纂》,如“五月事忌”引:“《便民图纂》曰:甜瓜沉水者,杀人,多食作阴下痒;生疮患脚气食之,永不愈;双蒂者,杀

^{①②}高濂:《遵生八笺》,见《中华医书集成》,中医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2页、第41页。

人,且此物不可与油饼同食。”^①《便民图纂》为明弘治间进士邝璠(约1458-1521)编订,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二称:“邝璠《便民图纂》十六卷,字廷瑞,任丘人,弘治癸丑(1493)进士,吴县知县,止官河南右布政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也记载《便民图纂》由邝璠始刻:“(《便民图纂》)嘉靖壬子刻于贵州,前有左布政使李涵序,称邝廷瑞始刻于吴中,吕经又刻于滇省。其中利民用者甚多。”^②显然,此书非瞿佑所能见。

《四时宜忌》还多处引用《万氏家抄》内容,如“五月事宜”引“《万氏家抄》曰:五日午时采鸡肠草晒干为末,齿痛热服者擦之,立愈。”而《万氏家抄》的编者为万表,“字民望,鄞县人,正德末武进士,累官都督同知,佾书、南京中军都督府。时值海寇出没,为江浙患,表推原祸本,以为奸民通番者所致,因此议,上之当事,历叙逋逃啸聚始末甚详。其后倭乱大起,表结少林僧,习格斗法,屡歼其众。”^③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四载:“万表《万氏家抄济世良方》五卷;又《积善堂活人滋补方》一卷;又《积善堂活人经验方》一卷。”可见,万表不仅是一员武将,还是一位著名的医家。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卷十五载《都督万鹿园先生表》称:“万表,字民望,号鹿园,宁波卫世袭指挥佾事,年十七袭职……嘉靖丙辰正月卒,年五十九。”^④可推知其在世时间为1498至1556年,则《万氏家抄》问世于正德、嘉靖年间。此时,瞿佑早已去世多年,不可能引用。

除此以外,《四时宜忌》还引用了《家塾事亲》、《保生心鉴》、《述见》等书籍。《家塾事亲》为郭晟著,共五卷,有天顺庚辰(1460)李贤序。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四载:“(郭晟)凤阳人,武定侯郭英裔孙。”该书影响较大,弘治壬戌(1502)进士何塘《家训序》提到了该书,称:“古人齐家之法,略见于《礼》之《内则》,朱文公纂集家礼已具载,司马温公《居家杂仪》盖亦祖述《内则》之遗意而为之者也,俱可遵行。近世如浦江郑氏《家规》、肥乡郭氏《家塾事亲》、上党仇氏《家范》,亦有可取。”^⑤明卢翰《月令通考自序》也称:“病中无寄意者,命仆抽书得《家塾事亲》,谓其事义欠切,欲缉而广之,屡困于病而未也。”^⑥可见,此书也是瞿佑去世以后问世的作品。而《保生心鉴》为令狐鏊所刊,《山西通志》卷一百三十八载:“令狐鏊,字仲平……嘉靖乙卯(1555)举于乡,为确山教谕……性至孝,母杨病疽,鏊调理无少怠,躬视汤药,更年母愈,人谓孝感云。著《性理纂要》、《五经巾箱》、《大学衍义》,日抄藏于家;刊《家礼集

①本文所引《四时宜忌》均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《居家必备》本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164册亦载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三〇子部“杂家类存目七”,中华书局,1965年,第1114页上。

③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〇〇子部“兵家类存目”,第843页中。

④黄宗羲:《明儒学案》卷十五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。

⑤何塘:《柏斋集》卷六《家训序》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⑥《经义考》卷一百四十九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要》、《保生心鉴》行于世。”也就是说,《保生心鉴》为明嘉靖年间令狐鏊刊刻。《述见》当为《事亲述见》之简称,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二载衡府高唐王厚瑛《事亲述见》十一卷。王厚瑛号岱翁,嘉靖时曾旌表令狐鏊孝行。可见,此书也在明嘉靖前后问世。

而《遵生八笺》成书于万历辛卯(1591)。其时,前举诸书均已问世,作为著名藏书家的高濂很有可能看到了这些书籍,并撮录而成“四时摄生笺”。

再次,《四时宜忌》乃辑《遵生八笺》“四时调摄笺”而成,保留了许多抄录的痕迹。如瞿佑作《四时宜忌》,将不可能出现如此纰漏。

《四时宜忌》在撮录《遵生八笺》的过程中,遗漏颇多。将《四时宜忌》与《遵生八笺》“四时调摄笺”对比,即可发现前者简略,后者详尽。如“正月宜忌”有条目云:“《千金月令》曰:是月宜食粥,有三方,一曰地黄粥……二曰防风粥……”前文既称有三方,而后只列举二方,显然有误。此条在“四时调摄笺”中为:“《千金月令》曰:是月宜食粥,有三方,一曰地黄粥……二曰防风粥……三曰紫苏粥……”两者对比,读者即可发现,《四时宜忌》抄录中漏掉了第“三方”,致上下文不合。此类现象在《四时宜忌》中比比皆是。

更为重要的是,在《四时宜忌》“五月事宜”中还出现了“高子曰”的文字:

高子曰:五月五日午时修合药饵者,以天罡此时正塞鬼户。《斗柄诀》以月月尝加戒,五月每日戌时,天罡指午,亥时指未,自未轮转,五日午时正指艮宫,为鬼户也。

而《遵生八笺》中“高子曰”恰恰是随处可见。《四时宜忌》既托名瞿佑撰,然而编撰者在抄录《遵生八笺》“四时调摄笺”时,将“高子曰”也不加分析地一并抄录,即留下了做伪的铁证。另外从句意分析,此段“高子曰”重在阐述“五月五日午时修合药饵”的理由。高濂“四时调摄笺”结尾处比《四时宜忌》此段多出了“故用此时合药甚效,又为天中之节”句,则因果关系顿出(“天中节”即端午节),此句也当为原本所固有。《四时宜忌》辑录时遗漏此句,导致句群因果关系不明,句意也不很顺畅,显系抄录者从简摘抄所致。从抄录留下的痕迹来看,《四时宜忌》实乃伪托瞿佑之所作,真正作者当为高濂。此外,现存署为瞿佑著的《居家宜忌》乃删削《四时宜忌》而成,内容亦均出于高濂《遵生八笺》,也非瞿佑作品。

感谢法国科学中心陈庆浩教授为该文写作所提供的指导与帮助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东南大学中文系